

文艺基础论集

周华斌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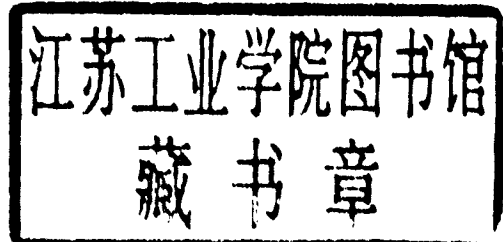
文艺基础论集

北京广播学院文艺编辑系供稿

主 编 周华斌

责任编辑 韩连仲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文艺基础论集

周华斌 主编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北京广播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81004-101-0/J7

787×1092毫米1/32 7.125印张150千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000 册 定价 3.50 元

目 录

- 坚持两分法，更上一层楼（代序）……………李振水（1）
- 评聂华苓的创作……………李献文（3）
- 大学散文教学内容的缺憾与方法论的引进……………于 君（33）
- 试论相声艺术的讽刺功能……………胡 恩（41）
- 相声的幽默化趋势……………韩连仲（56）
- 《长恨歌》与《忆真妃》比较研究……………孙桂春（64）
- 实景清而空景现，真境逼而神境生——浅论戏曲的虚与实……………石树源（79）
- 关汉卿及其剧作的成就和特色……………吕晓平（93）
- 论杂剧的勃兴……………周华斌（124）
- 电影剧本中描述部分的文学性初探……………郭正卿（143）
- 谈谈电影音乐的电影化……………陈 吟（156）
- 中国电影的长镜头管窥……………张凤铸（170）
- 戏剧的基本特征……………张善明（195）

坚持两分法 更上一层楼

李 振 水

近两年来，文艺编辑系的师生，重视了科研工作，在条件差，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克服困难，做了许多新的探索，花了不少气力。他们结合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实习、密切联系文艺战线的实际，联系广播电视文艺的实际，积极开展科研活动，撰写了一批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并分别加以整理汇编成册出版。这对进一步推动学术交流，繁荣文化艺术，促进教学改革，加速学科建设，做了有益工作，迈出了新的一步，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但应当看到，我们的科研工作，还刚刚起步，它同事业的发展，教学的需要，人才的培养，学科的发展，尚有一定的距离。我们应该努力来缩短这个差距，要迎头赶上去。

改革，开放、搞活，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随着经济、政治、教育体制改革的进行，我们的文化艺术教育将更加繁荣。为迎接这个美好的春天，我们的思想要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要迈的更大一些。搞封闭式的办学，肯定是办不好的；同样，关起门来搞科研，闭门造车，无疑是上不去的。解决的根本途径是，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加强与电台、电视台文艺部门以及其他业务部门的横向联系，深入改

革的实践，研究新现象，解释新问题。

开展科研工作，要讲求实效，不能拉花架子，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把教学改革，人才的培养，学科的建设密切结合起来。因为教学质量的提高，有赖于科学研究的开展，没有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就不可能培养造就出高质量的人才，二者是互为作用，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因此，希望同志们在已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认真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博采众长，走自己的路，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在一些学科领域建起优势，形成自己的特色。胜利永远是属于那些勇于探索，勇于进取，勇于创新的人。愿共勉。

论聂华苓的创作

李 献 文

一、聂华苓的创作历程

台湾和海外著名女作家聂华苓在她的散文集《三十年后——归人札记》中作过简要的自我介绍：“聂华苓——写小说的。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在台湾写作、编辑、教书十五年；现在是一个东西南北人，以美国爱荷华为家。三十年后，和丈夫安格尔以及两个女儿薇薇、蓝蓝回中国探亲。”从这段概述中，可以看出大陆是她生长的根基，台湾是她发展的枝干，而美国是她繁茂的绿叶。经过几十年坎坷后，她又回归故土探亲访友，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女作家挣扎、苦斗、奋进，走过了复杂曲折的从怨到爱的艰苦历程。

聂华苓以她独特的风采和横溢的才华著称于台湾与海外文坛，并以她卓有成效的文化活动而蜚声世界。从五十年代起，她用细腻园熟的笔创作了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中篇小说《葛藤》，短篇小说集《翡翠描》、《一朵小白花》、《聂华苓短篇小说选》、《王大年的几件喜事》、《台湾轶事》，以及散文评论集《梦谷集》、《黑色、黑色，最美丽的颜色》、

《三十年后——归人札记》，传记《沈从文评传》等，此外还有多种译著行世。她的一些作品已经译成英文、葡萄牙文、波兰文、匈牙利文、意大利文、罗马尼亚文、希伯莱文发表。

1925年聂华苓生于湖北应山县的一个世宦之家。她生逢乱世，从小就过着流离张惶的生活。她的父亲聂洸是桂系的人，长期在家赋闲，因派系斗争，经常受国民党特务的监视。有时半夜醒来，会发现父亲不在，为了逃避追缉而漏夜出走了，所以她“从小对政治恐惧就受够了”。可是偏偏在1934年，其父“去贵州当了八个月不大的官。红军长征经过那里。兵荒马乱的年月，谁分得出桂系嫡系，就把他当蒋家的人办理了”。^①家庭的剧变给她幼小的心灵蒙上一层浓重的阴影，杀父之仇使她心中系上了一个“疙瘩”、对革命、对共产党产生怨恨畏惧。

抗日战争爆发，十二岁的聂华苓和全家卷入灾难和逃亡之中。她回忆说：“逃难的滋味是够苦的，迄今回忆起这段生活，犹有余悸。那时候长江三峡很危险，我们的木船差一点翻了。日本飞机在武汉和宜昌轰炸，好几次住的隔壁都掉了炸弹，吓出一身冷汗，我们可算是九死一生的人。”^②聂华苓从武汉逆流而上，逃亡到湖北恩施读书，经历了艰苦的磨砺：吃的是掺杂砂子和老鼠屎的“八宝饭”，患有疟疾，满身生疮。这段逃难生活，使聂华苓饱尝战乱颠沛流离之苦，置身于备受凌辱而又坚强不屈的人民群众之中，使她开阔了眼界，体验了人生。她有着深沉的忧国忧民的思虑，为以后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她到重庆后，考入四川长寿十二中学，这时她特别喜欢

读冰心的作品。中学毕业后进入中央大学就读，期间正逢中国话剧运动蓬勃发展，她有时候走几十里路从沙坪坝到重庆去看曹禺的话剧。这时候的戏剧对她有较大影响，可以看出她在读书期间就受“五四”以来进步文学的熏陶。

抗战胜利后，聂华苓来到南京。虽然她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基于一个中国人的正义感，参加了反内战、反饥饿游行。她曾以“远方”的笔名发表了处女作《变形虫》。这是一篇讽刺“那些在内战中跟风而动的风派人物”的散文。尽管如此，由于“怕革命”、“怕共产党”，父亲被杀的疑虑与恐惧，仍郁结于心，对国民党当局仍存在着幻想。1949年她一家五口从大陆来到台湾。

台湾是聂华苓人生旅程的第二站，也是她创作的成熟期。为了养家，她在台北参加了雷震主编的《自由中国》杂志，任文艺栏编辑。正直不阿的聂华苓，在五十年代初反共文学充斥台湾文坛的时候，不随波逐流。她“不登那些反共八股，不参加党部组织的作家协会”，而刊登有生活气息、有艺术价值的作品，所以不断受到当局的干扰和攻击。十一年的编辑工作，使她接触了大量作家，思想比较开放。经过多年的体察与自身的遭遇，对现实逐渐有了认识。《自由中国》言论比较大胆，敢于针砭时弊。该刊因发表了《抢救教育危机》一文，使雷震被国民党开除出党。1956年该刊在“祝寿专号”里批评了“老头子”人格上的一些缺陷，批评了特务统治，而使主编雷震因“涉嫌叛乱”的罪名被捕，监禁整整十年。聂华苓也受到株连。

1960年《自由中国》被封闭后，聂华苓也成了“嫌疑犯”而失了业，在特务严密监视下过着揪心的日子。生活的贫困、

精神的打击、思想的震动，使她陷入沉思之中，睁大眼睛看台湾的社会现实。她对国民党当局的幻想也开始破灭了，在惶惑痛苦中，只好埋头写作与翻译，以文为生。在这期间，她潜心创作了不少优秀短篇和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

聂华苓在《失去的金铃子·写在前面》中说：“那是我一生中最黯淡的时期，恐惧、寂寞，穷困。我埋头写作。”小说“在那一刻写出并且登出，对于那时的我却是非常重要的。”作品最初在《联合报》连载，台湾文坛反响强烈，并多次再版发行。从此，聂华苓声誉斐然，这强烈地激发了她的创作欲望，使她步入了创作的高峰期。

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坛西化倾向相当严重。聂华苓同样受西方文学影响较深。她说：“我们这些相当西化的人，没有直接的文化遗产可以继承、模仿，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向西方学习。”^③她在1958年前后对亨利·詹姆斯就有相当研究，翻译出版了他的《德莫福夫人》。在这段时间，女作家还发表了现代派小说《月光·枯井·三脚猫》。

1962年，聂华苓应台湾大学和东海大学之聘，教文学创作和现代文学，有机会广泛涉猎鲁迅等二、三十年代优秀作家、作品。这样，使其更进一步容纳“五四”以来优秀文学传统，在创作上得益匪浅，而且体味到“中央日报掩藏下的鲁迅却在‘呐喊’。我听见狂人说：‘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甚至看见小栓吃着浸了死人血的红馒头……’^④这些都有助于她认识旧社会的吃人历史和人生的不合理，对她消除怨恨与恐惧以及对国内的是非曲直的判断都很有启迪。

在台湾的十五年，是聂华苓生命史、创作史上的重要年代。她说：“台湾是我十五年的‘家’（1949——1964），我在

那儿写作、编辑、教书。但是，和我一起为民主运动而工作的朋友们都因‘叛乱罪’被台湾的政府抓进牢里了！我们的杂志被勒令停刊了。我整日生活在恐惧中。”^⑤在这种情况下，她说：“对国民党的‘法统’呀，‘自由’呀，我看穿了。”台湾不能呆下去了，到哪里去呢？“可是同大陆，好像还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个人恩怨。”^⑥到底出路何在？聂华苓苦苦思寻着。

1963年，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闯入了她的生活圈子。1964年，聂华苓冲破重重阻力到美国爱荷华“作家工作室”工作。到美国后，“可以睁着眼睛看海峡两岸的社会，可以读到各方面的报纸刊物和书籍（包括美国的）；可以在爱荷华接触世界许多地区的作家和作品”，所以“视野阔大了”，“感情冷静了”，“看法客观了”。^⑦她跳出个人恩怨的小圈子，用历史的眼光去观察世界，剖析中国，消除了杀父之仇的恩怨，并同安格尔合作翻译出版了《毛泽东诗集》。可见女作家对大陆与台湾、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对新中国由怨到爱；对共产党由恨到敬。这种思想转变，使她能从更高层次上来构思和创作小说，从而走向创作的成熟之路。

在美国，聂华苓致力于世界文化交流。在她倡议下，于1967年在爱荷华成立了“国际作家写作室”。十几年来，已先后组织接待了七八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几百位作家到此进行交流和写作。鉴于她在国际文学交流中作出的重大贡献，受到世界各国作家的称誉。1976年，南斯拉夫作家阿哈密德·伊玛莫利克为首的二十六位作家（代表二十四个国家）倡议推举他们夫妇为诺贝尔和平奖金候选人，很快就得到二百七十

位各国作家的签名响应。1977年安格尔退休后，聂华苓主持“国际写作计划”的工作。

聂华苓孜孜不倦地为中美文化交流，为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作努力，她是一位架设心灵桥梁的杰出建筑师。

众所周知，作家的生活道路和他的创作道路是紧密相联的。作家的生活环境、身世、遭遇，必然对他的作品产生深刻的影响。聂华苓人生的坎坷历程，为其创作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与人物形象加深了生活厚度。女作家笔下的许多人物，无论是《台湾铁事》中各种各样的小人物，还是《失去的金铃子》中的女主人公苓子，或是《桑青与桃红》中的桑青（桃红），都溶进了她辛酸的经历、切身的体会和不断的探索与追求。她在创作上一贯追求的目标是写真实。她自称自己是“一个安分的作者”，即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作家。在她六十年代前后的短篇小说创作和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她这种创作主流。但聂华苓又是一个坚持走自己独特创作道路的作家，她说：“我们写作一定要有自己的路，一定要在内容上、技巧上、组织结构上摸索出我们自己的创作道路。”在创作上她“希望溶传统于现代，溶西方于中国。”^⑧

写于1970年的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是聂华苓的代表作，“是一个‘安份’，的作者所作的‘不安份’的尝试”。^⑨

小说通过桑青与桃红这个具有双重人格的艺术典型——精神分裂者的逃亡命运，来象征旧制度给一代中国人造成的精神痛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45年到1970年中国历史的变迁轮廓。作家说：“我不仅是写一个人的分裂，也是写一个人在中国变难之中的分裂，和整个人类的处境：各种的恐

惧，各种的逃亡。”^⑩作家以大手笔的艺术魄力，把人的命运与历史进程巧妙地结合起来，使作品有一定的纵深感和历史感。在创作方法上她也作了大胆的突破与“不安份”的尝试，它溶合传统小说的叙述手法、戏剧手法、诗的手法和寓言的手法。小说的人物描写、场景构思、情节安排，都含有丰富的象征意义。总之，《桑青与桃红》代表了聂华苓创作的新高峰。

1984年聂华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作了歌颂中美两国人民友好情谊的长篇小说《千山外，水长流》。

聂华苓是相当成功的作家。她的小说创作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但她又善于在传统的写实手法之中溶进西方的现代技巧，做到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统一。她的作品虽然不多，但造诣颇高，有独特的风格。著名老作家徐訏先生在《一朵小白花·序》中说：“自信我在哪里读到华苓的作品，她即使不署名，都会认得出是她写的。因为她的作品都是很有个性的作品，好处是她自己的，缺点也是她自己的。”台湾评论界认为聂华苓是“时下第一流的小说家”，这是非常恰当的评价。

二、短篇小说的成就

聂华苓的短篇小说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她从几部小说集中精选出十个短篇汇萃成《台湾轶事》，1980年在国内出版。作家在《写在前面》中说明，这些创作于1949—1964年的小说，“全是针对台湾社会生活的‘现实’而说的老实话。小说里各种各色的人物全是从大陆流落到台湾的小市民。他

们全是失掉根的人；他们全患思乡‘病’；他们全渴望有一天回老家。我就生活在他们之中。我写那些小说的时候，和他们一样想‘家’，一样空虚，一样绝望——这辈子回不去啦！怎么活下去呢！”作家敢于正视社会现实，冷静而痛切地体察生活，用她那支锋利而幽默之笔，撩开台湾社会的一角，生动形象地展现出小市民的众生相。

有家难归，有国难投，这是从祖国大陆流落到台湾的数以百万计人们的满腹乡愁。聂华苓短篇小说的成就在于她倾力描写了失根的人在台湾的喜怒哀乐和他们的思乡之苦。这些小公务员、小知识分子、小职员，都受着经济困顿拮据和精神苦闷空虚的双重煎熬。《爱国奖券》中的一群小人物就是代表：乌效鹏生活极端空虚，为了排遣心中郁闷，他一天到晚只得在三个榻榻米的房间里，“轰轰烈烈地进行长途散步”；万守成有家难归，老婆孩子都在大陆，仕途又无望，为了消磨时光，他整日整夜抄东西，整天做中奖梦，梦美之时一大块石灰掉下，正中头上，梦醒魂惊；顾丹卿对生活完全厌倦，连话都不想多说，只是沉默；顾太太如惊弓之鸟，时时窥看门外有没有特务监视。

这些极度绝望的人，合伙凑钱买爱国奖券，把一切的希望与幻想都寄托在虚无的中奖上。“买一张，等一次，等中奖，等，等，等，等到何时了？”他们的可笑而可悲的中奖之梦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这篇小说在深沉的思乡情绪中发出了悲愤的哀叹：“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小丈夫不可一日无钱。”这些既无权又无钱的升斗小民，心境孤寂，痛苦不堪，在高压之下有苦难言。作家对台湾中下层人民的苦闷与绝望，体味得最深，描绘得淋漓尽致。

《王大年的几件喜事》是作家本人最为喜爱的一个短篇。它描写了一个简单的故事：受到当局嘉奖的模范教师王大年，屋子里虚缥缈地吊着“大年的工作表”，私下里却和好友夫子郑重其事地筹划养鱼的庞大计划。但因书生气十足而使发财计划夭折在构想的梦幻之中。故事虽单一但内涵很丰富：通过王大年表里不一、名不副实的行为，既嘲讽了台湾教育界的现状，又写出了小职员的窘迫生活和他们的思乡怀国的缕缕情思。小说中可以看到从大陆到台湾的小知识分子的种种遭遇，以及他们的梦想与幻灭，挣扎与消沉。作品中还成功地运用了象征手法，给读者以思索。知名学者、诗人陈世骧在评论中指出：“《王大年的几件喜事》象征什么？一指透窗，见孔必粗”。“‘喜事’者，伤国运也”；“‘大年工作表’，文教衰而浮俗也”；“发财计划之可笑，帷幄运筹小人之空幻无济也……”^①聂华苓尖锐而勇敢地揭露台湾窒息的生活现实，由此可见一斑。

从大陆到台湾的男男女女，空虚迷惘、寂寞苦闷者不乏其人。聂华苓含泪写下他们铭心的孤寂和痛苦，以及对大陆亲人的深切怀念。高老太太和袁老先生都有一股压抑于心的难于排遣的寂寞与忧伤。《高老太太的周末》中的高老太太与儿子、女儿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周末，他们各自去跳舞、听音乐会，把孤独难熬的母亲留在家里，只有《昭君怨》幽怨苍凉的曲调，象一根柔丝轻轻绾住了她的心，“她忽然感到无底的空虚，仿佛一个人孤零零地悬吊在万丈深渊里，什么也抓不住”。她只有从思念大陆死去多年的丈夫身上得到慰藉。《寂寞》中的袁老先生有房子、儿子。而今儿子之耕成亲，喜事临门，他满心欢喜向别人述说内心的喜

悦。但亲戚、邻居、朋友、陌生人，都不理解他。与下代人的隔阂，与本地人的隔膜致使他终日无人与言，只好找不谙人事的小鸭子讲话。“杀我也不怕，一个人呆着，实在闷得慌”。普天之下，没有一个人了解他。作家擅长刻画人物的内心悲苦，用白描手法来揭示他灵魂深处的空虚与苦痛。

作家把对故土的怀念和追忆往昔美妙的青春、爱情和友谊交织融汇在一起，展示人物的性格、命运、思想和感情。这也是聂华苓短篇小说创作的成就之一。《珊珊，你在哪里？》是写得最为出色的一篇。小说采用意识流的手法，巧妙地将今昔时空有机地交错在一起。男主人公李鑫人在车内，思接天涯。他乘车去寻访“生命中第一个女孩，一直供奉在他心弦上最隐秘、最神圣的一角”的珊珊。车上的秦老先生说到在四川干过行政专员时，他眼前立即浮现出第一次见到珊珊的情景：她仿佛就是由那天国的光辉中走出来的，那是天使般美丽动人的女孩。公共汽车驶过水果摊，他看见那黄澄澄的桔子，就想起了当年和珊珊一道去桔园偷桔子的情景。那活泼天真，带着梦幻美的珊珊，简直是一首诗。车里上来一个孤傲自赏的女孩，李鑫的思绪又飘向珊珊。她那嫣然飘逸的风韵，那娉娉婷婷的身姿，都令他神住和沉迷。可眼前的邱太太，挺着大肚子，有一双浮肿的脚，俗不可耐的谈吐，津津乐道地介绍打牌经，与昔日的珊珊相去十万八千里。可是眼前的邱太太千真万确的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珊珊。昔日美丽动人、纯洁高雅、富有魅力的少女，如今已成为粗俗丑陋的大母鸭、语无伦次的“话匣子”。这鲜明的对比，撕碎了李鑫追寻传统美的梦想。面对传统的失落，作家发出“珊珊，你在哪里？”的哀叹与呼喊。小说曲折地表达

了作家对台湾世风颓败的惆怅感慨和对大陆美好生活的神往、对青春爱情的眷恋。

《一朵小白花》描写两个老同学在台湾的重逢。现任小学校长的谭心辉一板正经、冷若冰霜，两个人见面时屋里的空气是一块凝固的冰，使丁一燕感到从心里凉到指尖。这是台湾社会重压扭曲了人的性格，现实中的失意和挫折使她变得冷膜不近人情。但当他们追叙往昔的友情时，冰墙消融了，两人都沉浸在美好的青年时代的回忆中：亲昵的绰号、跑土匪的虚惊，捉弄舍监的有趣情景……。纯朴的笑声，戏谑的动作，又一一出现。她们恍若又回到大陆，一燕专断地给心辉戴上一朵小白花，手挽手哼着歌，令老校工瞠目结舌。小说深情地写出对逝去的青春与友谊的惋惜和呼唤。这是“一篇很完整的作品，两个人物的个性也写得很成功。”^⑫

流落台湾的女子，在家庭、婚姻、爱情上受到的挫折与痛苦更为深重。她们象无根的草木，任随风雨凌辱；好比断缆的孤舟，随时都有被狂涛恶浪吞没的危险。《一捻红》的女主人公李婵媛在大陆时与丈夫叶仲甫感情深笃。来台后，因生活所逼，为了孩子、为了生活，委身于纱厂赖老板。但只是同居，誓不结婚。她日夜怀念着大陆的丈夫，内心十分负疚和痛苦。作家细腻传神地描写出她心灵深处的悲苦与挣扎，当她听别人哄笑地议论她时，“退了一步，贴墙站着，愣愣地。晚霞已褪尽。灰苍的墙。灰苍的天。婵媛就象一个无生命的美丽的标本，贴在一个灰苍的大匣子里。”在家国不能团圆时，台湾就是灰苍的大匣子，而流落台湾的不少女性正是无生命的标本。这折射出婵媛受侮辱的难言之隐痛。这类题材的小说还有《李环的皮包》等。